

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，秉持普及国学知识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宗旨，于2008年开设“国学论谭”专版，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关注。所刊文章，迄今已达200多篇，可以说是蔚成大观。为了便于保存和阅读，读者吁请裱成一集。事竣，编者希望我这个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、整理、出版的九四老人，对于现在比较热门的“国学”说点认识，以利读者解读。我是非常乐意为之的。我想起了曾经为朱自清先生的《经典常谈》做过一篇导读文章。如今翻检出来，感觉自己对“国学”的理解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甚至以为对于现在有兴趣的读者还有一些帮助。因此，对这篇文章加以梳理一过，作为这本《国学论谭》的弁言，以期抛砖引玉，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和传播我们的传统经典文化。

著名学者、文学家朱自清(1898-1948)的《经典常谈》，是一部介绍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、学习传统文化典籍(也叫国学)的入门书、打基础书，又是极有学术分量的书。这部书所说的“经典”，其涉及的范围较广，不限于传统的“十三经”、“四书五经”等经部书，也包含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在内所有可称“经典”的著作。这本书可以同时适应三个层次读者的需要：第一是初学者，对初学者特别有用，因为所讲的都是最基本最精要的传统文化知识；第二是对已有一定文史知识基础的读者，也有很大用处，因为它指引由此循序而进的学习途径与方法；第三是对学已有成的读者，也有很多的用处，因为这是作为一代学者朱自清对传统文化典籍研究的一个总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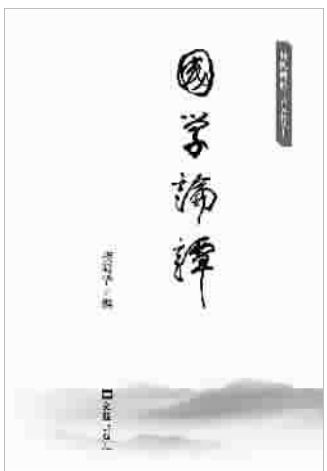
朱自清先生写这部书的出发点，我想也应该成为《国学论谭》编著者的共识。《经典常谈》不用“国学”名字。朱自清说：“‘国学’这个名字，和西洋人所谓‘汉学’一般，都未免笼统的毛病。”他也不赞成用“国

学概论”一类做书名，因为“‘概论’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；‘概论’里好像什么都有了，再用不着别的——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！”但本书内容，除了仍“按照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顺序”，“以经典为主，以书为主”，另外关于历代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文学家以及诗人等，也在介绍论述的范围之内。又是书，又是人，都得评述一番，放在一本小册子里，当然也只能“都只有一点儿”。但如何掌握这“一点儿”，使之恰到好处，就要看写作者的学术功力与水平。

通俗化，就是普及化，是把某一门较深奥的学问，用通俗浅显的语言文字讲解出来，普及给大众，让大家看得懂，发生兴趣；并且由此作为阶梯，逐步升上去，作更高层次的探索。

通俗化是传播各种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。通俗化的工作，看看容易，做起来很不容易，常常吃力不讨好，或有力使不好。这需要社会的提倡，尤其需要有学界的有心人和热心人。但光有心不够，光有热心也不够，还必须是这门学问的行家，必须写得出生动流畅的文章。具备此三者写出来的通俗学术读物，方可举重若轻，深入浅出，文以载道，道借文传，受到大众的欢迎。

我们知道，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。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，这是五四运动早已解决了的问题。但一股脑儿反对读经，走极端，弃之如敝屣，造成文化的断层，这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。这却是五四运动未曾解决好的问题。经典训练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来的。朱自清说：“读经的废止并不就



▲《国学论谭》封面(文汇出版社)

是经典训练的废止”；“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。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”。他特别指出：“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，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，也有接触的义务。”他所说的“有相当教育的国民”，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国民；所说的“接触的义务”，是指国民接受经典训练的义务。他把经典训练提到国民义务的高度，就是确定它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。也就是说，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中国人，有义务通晓本国传统文化有关经典的基本知识。

朱自清通过《经典常谈》一书，提出经典训练这个问题的時候，离开五四运动还只二十多年一点的时间，他已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。现在，离开五四运动九十多年了，中间经过了大革文化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所有传统经典被一

扫而空，已不仅仅是有无经典训练问题了；影响所及，虽有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“国学热”，但浮在表面者多，赶时髦者多，而注意基础训练者少。所以，朱自清先生提出经典训练的重要性，依然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朱自清先生所运用的重要的通俗化手段，是围绕经典这个主题，从大量有关的史事史话中，选择融合最重要的部分，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。因为史料太多，所以必须加以选择；又因为经过筛选的史料，不能原样照搬，还得融会化解，使之成为全书的有机组合。这一通俗化的手段，便是一改写，二翻译。改写主要用于史事叙述方面，翻译主要用于人物对话方面。

大约朱自清在昆明写作本书的同时，范文澜在延安集合了几位青年史学家，开始写作多卷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对史料的熔铸提炼，基本上也采用改写、翻译的办法。不仅所有人物谈话用白话翻译，连诏令、制策、奏章也改成白话，作为历史书通俗化的尝试，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他们南北呼应，不谋而合，都是具济世胸怀的学术有心人，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播做出了贡献。

现在，我们拿到的这本《国学论谭》在运用通俗化的手段上，与朱自清当年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。

朱自清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器度，可以四字尽之：平和宽容。他们即使学术观点对立，争论激烈，各不相下，亦必相互尊重，不挟嫌排挤。最有名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胡适、傅斯年力排众议，推荐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当然，郭沫若也并没有因

此而改变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。这就是学者的风度。朱自清写《经典常谈》时，知识界已普遍受到左倾影响，表现出激进的倾向，右翼的胡适首当其冲，他的一些著作不受重视，甚至令有些人不屑一顾。但朱自清却能保持独立精神，不作左右摇摆。如《诗》一章，论杜甫的诗，即引胡适《白话文学史》的话：“而杜甫写‘民间的实在痛苦，社会的实在问题，国家的实在情况，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’，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。”其中单引号中的话，就是引用胡适《白话文学史》对杜甫的评价。朱自清先生在《经典常谈》里，也不用流行的术语，如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等；说到《西游记》只说“以设想为主”，说到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只说“是写实的”或“写实的作风”。对古典文学作品务求实事求是评论，不乱贴标签，这是务实的学风。

我们读一本书，一方面固然希望这本书有独立的见解，予读者以新知；但是另一方面，读者自己也必须保持或学会一定的独立判断能力，不妄信，不盲从，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，即使这些问题提错了也不要紧，承认改正就是，但得到了思考问题的训练。

经典中还有许多问题可待继续研究。这也是正常的。如果什么问题都已解决，一劳永逸，不用再动脑筋，学问也就停止了。我以为，这也就是推出这本《国学论谭》的一个出发点。

七十多年前出版的《经典常谈》，和现在出版的这本《国学论谭》，无论在内容、形式还是写作风格上，都有很大的不同，但它们在普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方面走的路子是一致的，在求真务实的学风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。因此，我相信《国学论谭》的出版，对于更好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和发展，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2015年7月15日，于上海
(本文为《国学论谭》一书的弁言)

宋词中的凄美爱情

◆ 喻军

说到宋词，就不能不提陆游。影响最大的，除了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，便是那阙被誉为千古绝唱的《钗头凤》了：“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；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，错，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旧痕红涴蛟绡透；桃花落，闲池阁，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，莫，莫。”

宋代词人各自命运不同，有人身居庙堂，却一腔忧患，频遭贬谪；有人一介布衣，混迹底层，遭际凄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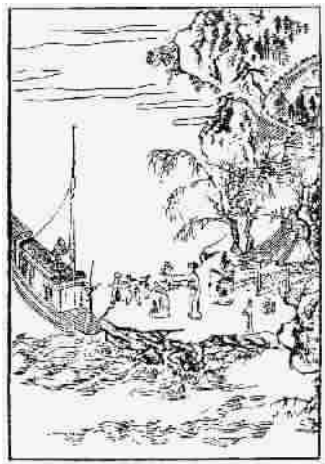
柳永和姜夔属于后者。柳永是个大才子，创慢词一路，生性落拓不羁。这样的才子既玩世不恭，又真情未泯；既放浪形骸，又善良挚诚。史载，柳永死时，“群妓合金葬之”，还每逢清明去祭奠他，谓之“吊柳会”。明冯梦龙“三言”中，就有一节专门描述此场景的文字。其墓前有一首题诗，嘲讽时人不识柳永之才：“乐游原上妓如云，尽上风流柳七坟。可笑纷纷缙绅辈，怜才不及众红裙。”

柳永之词写的委婉动人，情意款款，且看那首《蝶恋花》：“独倚危楼风细细，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。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阑意？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

最后一句中的“伊”原意为“意中人”，只是后人的解读，已超越特

定所指，而泛指人生追求的目标了。

相比于姜夔，柳永还算是幸运的。至少还有人怜惜他的才华，后事还有人操办；姜夔却一生穷愁潦倒，死后竟一时无入殡葬，后草草被人埋于钱塘门外。若不是他的那些气韵高妙的词作，谁能记得宋朝还有此人？也许一生给过他温暖记忆的，还是他一两段朦胧的情事。仅述其中一段：他年轻时曾去合肥，住在一座桥边，爱上了一位在附近弹琵琶的歌女，且歌女还有一位喜操古筝的妹妹。姐妹俩看姜夔文辞清旷优美，便乐于与之结交。他们陪着姜夔游



▲柳永《雨霖铃》词意图

览巢湖、姥山，在湖光山色之中，弹唱姜词，互诉衷肠。但其后不久，金兀术攻破合肥，铁路所至，烧掠抢杀，这对姐妹从此不知所踪。姜夔面对满城废墟，痛彻肝肠。遂写下那阙著名的《鹧鸪天》：“肥水东流无尽期，当初不合种相思。梦中未比丹青见，暗里忽惊山鸟啼。春未绿，鬓先丝，人间别久不成悲。谁教岁岁红莲夜，两处沉吟各自知。”

治平元年(1064年)12月，苏轼从陕西凤翔任上离职返京，接受朝廷“磨勘”，但到京不久(1605年5月28日)，即传来噩耗，苏轼发妻王氏病逝，年仅27岁。王氏可谓贤良温婉之妻，谨奉翁婆，相夫教子(苏迈)，且对不谙官场世故的苏轼有诸多呵护。直到10年后，颠蹶失意、宦海沉浮的苏轼，倍加思念起亡妻来，他以哀婉至极的笔墨，写下了那首催人泪下的《江城子》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岗。”

读南宋之词，犹感郁积。前有北宋覆灭、二帝蒙羞；后有铁马金戈、山河破碎，这不能不影响到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创作心境。一腔国恨家仇、报国情怀，便倾泻成或激越或铿锵的文字。而作为中国最优秀女词人的李清照，则更多地把个体际遇和国家命运加以联系，写出来的词作显得更加真切动人。特别是靖康之变后的一些作品，既溶入了对

今年上海书展，本报星期天夜光杯的“国学论谭”“市井故事”版面将推出“新民晚报·夜光杯丛书”《国学论谭》和《人间处处有真情——〈新民晚报·市井故事〉精选》。8月24日下午2:30—3:30，在延安中路1000号上海展览中心西阳光蓬活动区将举行“新民晚报·夜光杯丛书首发式暨签售活动”。著名学者陈尚君、骆玉

国家命运的忧患之情，又隐隐透出对厮守了近30年，却遽然离世的丈夫赵明诚的深切思念：“风住尘香花已尽，日晚倦梳头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闻说双溪春尚好，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，许多愁。”(《武陵春》)一个是悼亡妻，一个是怀亡夫。在苏轼这里可以直抒悲情，清照却只能凄凄惨惨、委婉道出了。

还有两首好词，是宋词中的经典之作。李之仪，哲宗元祐初枢密院编修，通判原州。此人博学多才，生性清正，曾得罪权相蔡京，被除名，遭流放。好在有一位出身书宦、“性高严，喜礼节”的贤妻胡文柔，与其共度时艰，不离不弃。但李之仪写《卜算子·相思》时，其妻已先他一步离开人世了：“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一江水。此水几时休，此恨何时已。但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”明白如话，却苍茫隽永，情思悠长。

秦观在宋朝算是一位比较特殊的词人，他生性敏感纤弱，有点像“林黛玉”。苏轼虽然对他极欣赏，但

小 启

明、韩昇、陈鹏举、胡中行将为《国学论谭》签售；老娘舅柏万青，著名画家韩伍，漫画家孙绍波，上海故事家协会副会长、滑稽王小毛之父葛明铭将为市井故事一书签售。欢迎读者光临。

也认为秦观“犹以气格为病”，也有人认为其部分作品近乎“女儿词”。但秦观的词名，在宋朝却仅次于苏轼，被誉为“词心”和婉约派的经典人物。因为他本心自然、灵魂纯粹、天资极高、至性至柔，反而创出新格。一曲《鹊桥仙》，可谓情思绵绵、美丽凄楚：“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
此词表面上看似似乎是歌颂天上牛郎织女之爱，实际上隐藏的意思是说就连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，也要比自己多次遭贬、妻儿离散的境况好过百倍。尤其第一节后两句的词意是化用唐朝诗人李郢的《七夕诗》而来：“莫嫌天上稀相见，犹胜人间去不回”。这是一种愤懑心碎之情，在人间欲爱不能，那么天上一年一度的鹊桥会便也值得羡慕了。

这类爱恨交织的词作在宋词中数量很多，它们就像是如水的月光，涓涓滴滴了千载，成为文学史上悠悠的绝唱。